

中日近代與西洋： 嚴復與福澤諭吉的異文化受容和思想構築⁺

區建英^{*}



東亞的近代與西洋文明受容的「脈絡性轉換」

在東亞的思想交流中，如果說儒學是核心的文化要素，那麼也可以說到了近代，西洋文明的引進也加入到東亞的思想交流中，而且成了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黃俊傑先生在〈東亞思想交流史〉中系統地提出了「脈絡性轉換」等分析方法，這與水田洋先生《思想的國際轉位》¹中提出的比較思想史的方法不謀而合，可以給近代思想交流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新視點。本稿擬嘗試運用此方法去分析近代東亞的思想史。

1. 與近代西洋相遇中的東亞時代脈絡

首先就近代東亞的一些共通的時代脈絡作一個簡單的整理。東亞的近代化大抵始於 19

世紀後半葉，這個時期的西洋，已經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而且展開了掠奪殖民地的競爭。這時中國和日本也被強行地編入這種國際秩序，面臨著被殖民地化的危機，為此，必須進行近代化的改革。這種改革正如丸山真男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是包含著兩個側面的：「一方面是使自己向外——即向國際社會開放，同時，面對國際社會又要把自己作為一國——即一個統一國家而圈畫起來。」²也就是說包含有兩重課題，一方面是為了使自國能適應時代要求，需要引進西洋文明——尤其是具有人類普遍價值的因素——而促進社會的轉換，另一方面是為了能抵禦西洋列強，必須把自國統合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換句話來說，在東亞地區，國家獨立和市民革命成了同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3 年 11 月 13-14 日本院與日本名古屋大學共同主辦「東亞思想交流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 日本新潟國際情報大學教授。

1 水田洋：《思想の國際轉位——比較思想史的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0 年）。

2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61 年），頁 9。

一個時期的課題。

另外，如果要看看東亞各國的一些個性的話，可以說，在這個時代，東亞各國依然持續著與「中國」這個「他者」對峙，從而摸索「自我」的形成，同時，又和中國一起共有著「西洋」這個新的「他者」，在那裡各自構築新的「自我」。不過，「中國」這個「他者」已經帶上了與以前不同的意義。比如在日本，隨著「西洋」成為他們所要追求的文明目標，「中國」便被作為頑固落後的反面教員來參照。這樣的思維方法，後來對韓國和臺灣都產生了一定影響。但中國本身，當然也有自己的歷史脈絡。

在這樣的狀況中，東亞各國在引進西洋文明時，自然會、也有必要進行脈絡性的轉換。

2. 引進西洋文明時的「脈絡性轉換」

丸山真男先生所說的兩重課題，在中國和日本各自有甚麼脈絡？是怎樣表現的呢？

在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就對引進「西學」表現出逐漸開放的態度，但同時又力圖保護作為「華夏」的屬性。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出現過「中體西用」論和「國粹派」等思潮，這些思維方法在引進「西學」中都是引領主流的。「中體西用」論把「中學」和「西學」看作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關係，「國粹派」則把「中學」和「西學」看作「主」和「客」的關係。在這個框架裡，「西學」的引進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當然也有過「全盤西化」的思潮，不過很難說這種思潮已真正貫穿到了中國思想之中。此外，還有另一種思維方法，那就是著眼於人類共通的普遍價值，注重從西洋文明中引進具有普遍價值的因素，這種思維方法與「全盤西化」思潮是絕對不同的。

在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幕末期就有過「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思想，把儒學

和日本的傳統看作精神文明，把西洋看作物質文明。不過，到了明治初期，採取了「文明開化」政策，開始了包括政治、倫理等領域在內全面地接受西洋文明。但實際上，在思想的深處，往往存在著站在儒學價值觀的立場上來評價和讚美西洋文明的傾向。而且「文明開化」也並沒有拋棄日本自身的傳統。雖然也出現過「歐化主義」的風潮，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而做出來的一種形式。而且，到了 19 世紀 80 年代以後，還出現了與「歐化」風潮對抗的「國粹主義」。「國粹主義」把日本的固有文化看作是「主」，把西洋文明看作是「客」。中國的「國粹派」就是受了它的影響。以上所舉的這些事例，都是由東亞各國的主體性產生出來的文化現象。

而作為兩國的共同點，可以說，中國和日本為了適應新的時代要求，都必須引進西洋文明的因素，從而改革傳統的弊病。這時候，當然不可避免地要用西洋文明來與自國的傳統進行交鋒。但是，在東亞各國的歷史經驗和傳統文化背景中，要完全不變地套用西洋的模式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在推進非常近代性的課題上，比如國民國家的形成。為了實現主權國家中的國民統合、樹立民族認同意識等，也不能光靠西洋文明，也需要發掘和發揮自國的傳統文化因素。總而言之，一方面，因為東亞各國有各自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現狀，所以為了把西洋文明中具有普遍價值的因素移植到自國，也需要從自國的脈絡出發，來重新把握和解釋西洋文明。另一方面，為了使西洋的那些具有普遍價值的因素能真正紮根於自國，還需要對自國的傳統進行解構和重構。這可以說是兩重意義上的「脈絡性轉換」。

中國是在與「西洋」這個「他者」對峙中構築新的「自我」，在那裡表現出了自身的主

體性的。日本則在與「西洋」和「中國」這兩個「他者」的對峙中樹立「自我」，是在那裡表現出其主體性的。儘管兩國的近代化顯示著不同的形態，但在引進西洋文明方面也具有很多共同點。在此，我想舉出在中日兩國各自被評為「西學」第一人的嚴復和福澤諭吉為例，談一些「脈絡性轉換」的具體事例。

對西洋文明的「脫脈絡化」和「再脈絡化」

首先，比較一下這兩個人物的東西文化觀，以此把握他們的個人脈絡。

先看中國的嚴復。嚴復承認人類存在著共通的普遍價值。他說：人類在東西兩地創造的智慧具有「暗合之妙道」。³ 同時他認為，那些人類共通的「妙道」是潛藏於各國特殊的習俗之中的，因此需要透過西洋的習俗來找出具有普遍價值的因素。他把「人性所大同」的「天下之公理」作為從西洋中選擇文明因素的一個原則。⁴ 他相信通過引進人類共通的價值來改善自己的國家，才能取得社會的進步。

再看日本的福澤諭吉。福澤是把人類的進步區分成「文明」、「半開化」、「野蠻」的三個階段，其中，把西洋看作「當今世界的智慧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的『文明』」，同時把日本和中國定義在「半開化」的階段。⁵ 從這個觀點出發，主張日本必須以西洋文明為追趕的目標。在這個思維框架裡，西洋取代中國成為了日本眼中的「文明」。這種思維方法，與後來日本把自己定義為學習西洋的優秀民族，要充當亞洲的「中華」的志向，是有一定關係的。

顯然，這兩個人物的東西文化觀很不一樣，但都同樣積極地引進西洋文明。那麼在對西洋文明進行「脫脈絡化」和「再脈絡化」方面，他們有什麼共同點呢？

先看看嚴復。當時的中國面對被西洋侵略和殖民地化的危機，不能有效應對，顯示出了「積弱」的嚴重問題。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積弱」主要表現在產業和軍事上。但嚴復透過「積弱」的現象，看到了更深層的問題，那就是中國人像一盤「散沙」缺乏公共精神，而且理性和創造性的能力也很低。所以，在甲午戰爭戰敗時，他有驚人的發言：「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戰敗何足以悲」。因為他感到真正可悲的是「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與民氣之已困耳」。⁶ 他痛感到人民的智、德、力衰退才是中國的致命問題，而為了發展人民的智、德、力，一方面，需要解放個人，另一方面，又需要樹立個人自發的公共精神。出於這種必要性，他從西洋文明中尋找具有普遍價值的智慧，引進了 19 世紀的自由主義，尤其是斯賓塞、密爾的思想，以及對 19 世紀的自由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亞當·斯密的思想。在那裡，嚴復發現了西洋近代的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那就是：個人的自由從根本上支撐著人民的智、德、力發展和內在的公共精神。

但有些西方學者指出，嚴復的這種理解並不符合 19 世紀西歐的自由主義的文本。⁷ 理由是在 19 世紀的西歐，個人主義中並不是那麼強調公共心或愛國心的。那麼是不是嚴復曲解或歪曲了西歐的自由主義呢？實際上，西歐絕

3 嚴復：〈救亡決論〉，收於王栻（編）《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52。

4 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嚴譯名著叢刊，1981 年），頁 405。

5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收於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59 年），頁 16-17。

6 嚴復：〈原強〉，收於王栻（編）《嚴復集》第一冊，頁 9。

7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不是對公共精神沒有關心的，早在文藝復興時代就開始探索公共精神等教養。只不過在 19 世紀的西歐，市民精神已經形成，自由主義思想也就不那麼議論公共心的問題了。嚴復是從中國的時代脈絡出發來觀察近代西洋的，他需要對西洋的歷史脈絡重新進行總體的把握。其結果，反而準確地把握了連西洋人也沒有明確意識到的、西洋自身的這個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這一點，給西洋帶來了新鮮感。⁸ 這個事例說明，嚴復在引進西洋文明時進行了「脫脈絡化」和「再脈絡化」。

我們再看看福澤諭吉。福澤提倡追求西洋文明時，所強調的主要不是軍艦和大砲，而是「精神的文明」，其核心是國民的「獨立心」。在此我們要注意到，他說的獨立心是與國家緊密關聯的。所謂「一身獨立而一國獨立」是他的一句名言。⁹ 福澤把國家的獨立看作是最重要的課題，甚至說：「日本人的義務唯有一條，就是保衛這個國體」。¹⁰ 而福澤的最出色的觀點，在於他主張「一身的獨立」才是支撐國家獨立的基礎。他認為，「沒有獨立之氣力的人，就不能深切地為國家著想」，「在國內得不到獨立地位的人，在外接觸外國人時，也不可能伸張獨立的權力」。¹¹ 用丸山真男先生的話來說，福澤是「把國家嫁接於個人的內面自由之中」。¹²

但是，福澤所學的西歐文明史和密爾等人的自由思想裡，也沒有特別強調國家獨立，反而是注重於防止國家政治權力的氾濫。那麼，福澤是不是曲解了這些西歐思想了呢？實際上，西歐對國家獨立絕不是沒有關心的。只不

過是在絕對主義王權時代就已經實現了國家獨立，17 世紀中期就已形成了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後來經過市民革命以後，對國家權力進行牽制和抵制成為了更為中心的思想。對此，福澤顯然是從日本自身應對 19 世紀的殖民地化危機的這個時代脈絡來把握近代西洋的。可以說，他是把獨立思想從西洋由國家獨立到市民革命的歷史大脈絡中抽取出來，把之放到 19 世紀後半日本的脈絡中重構，由此找到了「個人獨立支撐著國家獨立」這一重要價值的。福澤的這個事例，也說明了在引進西洋文明時的「脫脈絡化」和「再脈絡化」。

對自國傳統的解構和重構

在考察近代思想交流時，黃俊傑先生的方法又使我進一步發現，不僅對外來思想，而且對自國的文化也有一個需要「脫脈絡化」和「再脈絡化」的問題。因為要引進西洋文明，並不是光把西文字母轉換成漢字就能達成的。即便是同一個範疇的概念，在西洋和東亞可能本來就包含著不同的含義。而且，引進一個西洋文化因素的時候，環繞在這個因素的周圍、並将要與這個因素結合的那些傳統的文化因素群，會對這個新來的西洋因素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如果要使西洋因素的普遍價值能紮根於自國文化中，就有必要對自國的傳統進行解構和重構，這時，甚至需要與自國的傳統進行一番交鋒。在此，我想通過舉出嚴復和福澤諭吉在引進「自由」思想時的事例，來談這個問題。

先看看嚴復。對於「自由」概念在西洋和

8 Louis Hartz, "Introduction," in *ibid.*

9 福澤諭吉：《學問のすすめ》，收於《福澤諭吉全集》第三卷，頁 43。

10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頁 32。

11 福澤諭吉：《學問のすすめ》，頁 43、45。

12 丸山真男：〈福澤に於ける秩序と人間〉，收於《丸山真男集》第二卷（東京：岩波書店，1996 年），頁 219。

中國的不同含義，嚴復是有明確認識的。他說在西洋是「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在西洋的自由裡包含著這樣的倫理觀念，就是「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¹³但是在中國的傳統中，自由一詞包含著「放誕、恣睢、無忌憚」等恣意妄為的負面含義，與倫理是相分離的。¹⁴因此，「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¹⁵如果無視了中西自由的這個區別，單純地把"Liberty"轉換成漢字，那麼，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就會帶著原來恣意妄為的含義而得到正當化，其結果，人們就會對「自由」更加忌諱和警惕。

而且在中國的傳統中，環繞著恣意妄為的自由，還有一群周邊的文化因素。關於這些因素群，嚴復特別指出了「三綱」和「一道同風」。¹⁶「三綱」道德缺乏平等性，而在宗法專制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被比擬為父母和孩子的關係，人民被看作是沒有自律性的孩子，只能接受「大人」的教化，在「一道同風」之中生活。這些就是環繞在舊有的自由觀念周圍的傳統構造。如果不使這個構造解體，那麼近代意義上的「自由」就難以在中國紮根。嚴復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嘗試了對這種傳統構造進行解體。尤其是對那種比擬為父母和孩子的官民關係，以及所謂「君為民之父」等政治習俗進行了分析，揭露出其抹殺了人民的主體性和權利的實質。¹⁷

同時，嚴復為了把中國原有的自由與倫理對立的關係扭轉過來，他還試圖發掘中國傳統中的倫理思想因素，並找出這些因素與近代自由的連接點。他說：「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¹⁸而西洋的自由是「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為界」，嚴復認為這種自由的倫理性，正好與《大學》的「絜矩之道」相通。¹⁹他試圖通過把自由與「絜矩之道」結合起來，而重新構築自由的倫理性。這就是對自國文化的脈絡轉換。

像這樣的脈絡轉換工作，我們在日本的福澤諭吉那裡也可以看到。在此只簡單舉出一例。福澤在引進「自由」思想時，也是清楚地意識到日本傳統中的自由與倫理是處於分離狀態，所以對之進行了慎重的解釋。他在《西洋事情》初編介紹「自由任意」的思想時，細心地加了一個註釋指出：「在自由任意裡，自由這個詞，並不是恣意放蕩而無視國法的意思。」他還說：「很難找到能確切翻譯 freedom、liberty 的含義的日語詞彙。」而且很擔心舊有的自由含義被簡單地套用於近代自由的概念。²⁰他在寫《西洋事情》二編時，又再次談到關於「自由」的理解，他解釋說：「自由的字義」，「絕不是恣意放蕩的意思，更不是損人利己的意思。而是指發揮心靈和身體的作用，人人相互不妨礙，如此謀求一身之幸福。」²¹在此，福澤也是明確地否定了傳統的那種割裂了倫理性的自由，並謹慎地闡明了近

13 嚴復：〈論世變之亟〉，收於《嚴復集》第一冊，頁3。

14 嚴復（譯）：《群己權界論》（北京：商務印書館，嚴譯名著叢刊4，1981年），譯凡例。

15 嚴復：〈論世變之亟〉，頁2。

16 前揭文，頁3。

17 在《孟德斯鳩法意》和《社會通詮》（北京：商務印書館，嚴譯名著叢刊3，1981年）的案語中有不少論述。

18 嚴復：〈論世變之亟〉，頁3。

19 嚴復（譯）：《群己權界論》，譯凡例。

20 福澤諭吉：《西洋事情》初編，收於《福澤諭吉全集》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1958年），頁290。

21 福澤諭吉：《西洋事情》二編，收於《福澤諭吉全集》第一卷，頁487。

代的自由所包含的倫理含義。這個事例，也表現了對自國傳統的一種解構和重構。

小結

本稿通過考察中國和日本的兩個思想家引進西洋文明的事例，注意到了一個共通的現象。這就是一方面，他們把具有普遍價值的近代因素從西洋的文化和歷史的脈絡中抽取出來，然後放到自國文化和歷史的脈絡中進行重新解釋；另一方面，又在會通東西文化的過程中，對自國的傳統文化進行解構和重構。這就是本論文所說的兩重意義上的「脈絡性轉換」。